

走过青春

我认识的延安北京知青

闫百成

1969年,先后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安上山下乡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这将永远载入史册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、进步、变化,北京知青相继被招工,进入了机关、厂矿和企事业单位,从此,生活开始了转变。

李增春,曾在下坪插队两年多,于1971年底被招到延安地区水利施工队,安排的工作是收发员。1973年以后,从事了电影放映工作。

两年的农村生活使他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。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,对组织分配安排的各项任务都爽快接受。工作中,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。正因如此,他也得到了领导、同事和单位周边居民的认可。在单位及周边一带,只要提起李增春的名字,真是老少皆知。

单位有一个多功能大礼堂,平常是饭堂、会议室,白天也可以在这里放映电影。一台放映机,伴随了他近二十个春秋。直到电视机普及后,这台放映机就完成了它的使命。

那个年代,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看电影。由于当时的影剧院只有一部片子,几家单位都要上映,这就免不了等片、跑片、倒片、搬运,相比之下,为负责这项工作的个人增加了劳动强度。可这一切,都是他一个人完成,并且无怨无悔。

伴随着岁月的流逝,他已经到了古稀之年,可那颗不老的心依旧奋发向上。只要是有益社会的活动,他都积极参与,不计报酬。在筹建延安北京知青

博物馆时,他跑前跑后,为博物馆提供了一些重要资料,得到了相关单位的表扬认可。

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”如今的他,虽然双鬓染白,但从未停止过前行的脚步,把自己的才华尽量展示出来。他先后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作品,在延安各类杂志、报刊刊登,用手中的笔描绘着美好的未来。

无独有偶,很多知青的故事同样让人回味。

当年的施工队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“王学晏的腿,李望伦的嘴!”从表面理解,一个是腿脚利索,行步如飞;一个是口若悬河,能言善辩。

王学晏,北京知青,个子矮小,其貌不扬,走起路来一阵风。他在中队担任材料员,每次领料时,仅凭两条腿往返。中队在延安南二十里铺沟门,距队部库房十多公里,有时领到几十公斤的机械配件,他都手提肩扛步行往返,令人心生敬意。

最使我敬佩与难忘的是北京知青张小弟,他曾在南泥湾插队,1971年被招工到施工队。在王窑水库大会战中,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。

工作中,小弟弟积极肯干,认真负责,从不计较个人得失,困难面前从不低头。他对同事仗义大方,谦虚温和,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。回京后,由于劳累成疾,患了绝症。去世之后,家属根据他的遗言,将遗体无偿捐献北京协和医院。他的一

生是奋斗的一生、坎坷的一生,他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最需要的人。真可谓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

1971年3月,延安大地依旧天寒地冻,冰雪尚未消融,杏子河上发生了冰河救美的故事。

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北京知青刘铁良和谢春萍。

王窑水库前期工程基本完成,计划3月9日大坝合龙。合龙之前,所有停在河对岸的机械设备全部都要转移过来。否则大坝合龙后,河水上升,再过河就困难了。

当时停在河对岸的有三台拖拉机,北京知青李万春、李望伦等人开着两台拖拉机在冰河上顺利通过。开第三台拖拉机的是刘铁良,陪同的是谢春萍。当拖拉机走到河道中间,突然一声巨响,人机瞬间沉入河底。河水不是太深,但足以没过整台拖拉机。看到这一幕,岸边的人顿时惊恐万分。突然,刘铁良的头露出水面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又钻入刺骨的水中,把谢春萍从驾驶室里拖了出来。在岸上人员的接应下,两人都脱离了险境。人无大碍,只是虚惊一场。

刘铁良身高一米八几,落水的那一刻,他临危不乱,急中生智,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祸。从此,二人的关系更为密切,最终结为夫妻,成就了一段姻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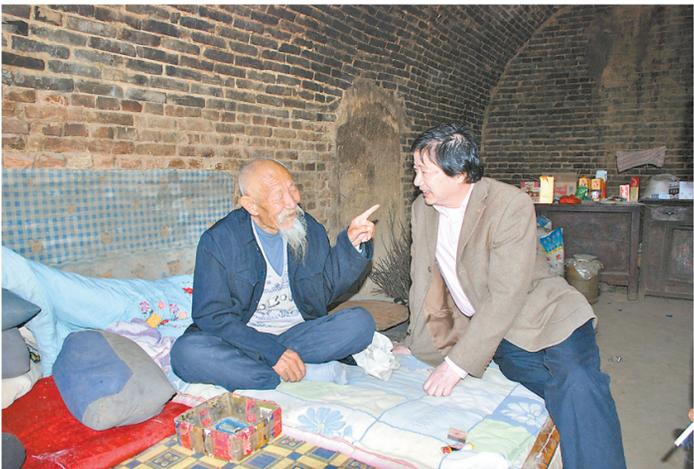
北京知青为延安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,他们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。



● “这么多年了,你们还能回来看看我们”



● 再回延安看乡亲



● 北京知青袁克定看望曾经担任郭家塬大队队长的聂江东老人



● 过去的小媳妇,现在都成了老太婆了。这次见面说的全是当年一起干农活时的糗事

去延安卖西瓜

王淑琴

陕西洛川曾是我下乡插队的地方,现在成了享誉世界的苹果种植基地。由于洛川地处渭北黄土高原,气候、土壤和地理位置成就了苹果的美味。除了苹果之外,这里的西瓜也长得又大又甜。

说到西瓜,那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块经济农田。在那个缺少少穿的年代,全村人都盼望着风调雨顺,西瓜丰收,能卖个好价钱,给队上增加点收入。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知青,自从知道队上要种西瓜,更是朝思暮想,盼着能早日吃上西瓜。

到了8月,眼看着西瓜长大了,我们几个知青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,专门休工一天,跑到瓜地去买西瓜。种瓜老汉一看见我们就笑了,因为在西瓜刚长到碗口大时,我们就偷偷地摘了一个,心里有数的种瓜老汉把丢瓜的事告诉了队长。队长很委婉地告诉我们,瓜没有长成吃不得,也是一种浪费。

这次,当种瓜老汉看到我们后,就赶忙招呼我们:“几个女子是来买瓜的吧!老汉我去给你们挑一个最甜的。”我们抱着买来的大西瓜回到窑里,几个人围在案板边,非常有仪式感地擦干净瓜皮上的尘土,一刀下去,西瓜皮炸裂,露出红瓜瓤。我们急不可待地捧起西瓜,一口咬下去,又酥、又沙、又甜,真是太好吃了。

到了中旬,西瓜开始大面积成熟,队长派会计俊峰、发贵和俊清三位村民,外加知青王敏和我一起去延安卖西瓜。能有这美差真是太高兴了!一来,可以游览革命圣地延安;二来,守着西瓜可以天天吃啦!当天下午,我和王敏就开始忙着跟老乡们一起摘西瓜。挑成熟的西瓜摘取,对于我们俩来说可是个技术活,种瓜老汉凭着他的种瓜经验,示范着挑选瓜的动作,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“一看、二拍、三听”。只见他蹲在地上,用那饱经风霜的大手拍拍这个,打打那个,然后果断地摘下。由于生熟西瓜的水分含量不同,所以响声也不一样。熟了西瓜拍打出来的声音有些闷,生西瓜敲击声则比较清脆。我俩重复着老汉的动作,仔细辨别西瓜的生熟。生怕摘了生瓜卖不出去而给队上造成损失。几个摘瓜的老乡发现我们拿捏不定的时候也会及时出手,帮助我们确认。最后,我们把精挑细选的一个个大西瓜抱到田头,装在架子上,装了满满的三轮车。几个人回家吃了点东西,踏着夕阳的余晖就出发了。

从洛川到延安大约要走上三天。三个年轻小伙驾着车,三头牲口在前面拉着,形成了一个不小的车队。我俩大步流星地跟在后面,心想马上就可以看到宝塔山了,不由激动万分。一路行走在通往延安的公路上,石渣铺成的路面坑坑洼洼,汽车一过,除了“嘎巴嘎巴”的响动,就是黄尘飞扬。走着走着,我和王敏远远地落在了乡亲们后边。天渐渐黑了下来,路上连一辆过往的汽车也没有,四周静悄悄的。路过村子时,偶尔可以看到窑洞里传出的亮光,听到几声狗叫。我是个特别胆小的

人,就害怕天黑,何况在这偏远之地。一路上,稍微有点风吹草动,我就异常紧张。我和王敏走在石渣路上,脚下发出的“嚓嚓”声都那么瘆人,总感觉自己后面跟着人……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,只是紧紧拽着王敏的手臂,心里默默地念着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;排除万难,争取胜利!”来给自己加油。

前面的乡亲们大概也走累了,停下来休息时,才发现我俩没有跟上。乡亲们用当地呼喊人的声调叫我俩:“哦——王敏,哦——淑琴……”这一声声呼喊划破了寂静的夜空。被黑夜吓得不知所措的我听到喊声后,立马有了胆量。“我们在这儿呢!”我随即回应。当走到乡亲们跟前,我俩就像泄了气的皮球,一屁股坐在地上,心里直后悔不该接受这趟“美差”。乡亲们看到我俩狼狈不堪的样子,心疼地说:“不行你俩就上车吧!”村民发贵还开玩笑逗我们说:“到时把你俩和西瓜一块卖了。”当时累得那还顾得上逗笑,我俩不管不顾地爬上了车,躺在西瓜堆上。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,伴随着车子的晃悠悠,我俩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车队走了一个晚上才走出洛川界,来到富县。车子停在一块玉米地旁,老乡把我俩叫醒。一睁眼,看到天空已经泛起鱼肚白,还能听到河水流淌的“哗哗”声,我感到新奇。因为洛川在塬上,不仅没有河,就连吃的水都很困难。穿过玉米地顺着水声走了过去,看到一片不宽的水面。水流湍急,银白色的浪花互相追赶着,声音很大。久违的河水直抵心底,我心里突然酸酸的。“此时咱们的家人都还在睡梦中呢,如果父母知道咱们走了一晚上的山路,现在还在这荒野之地,得多操心呀!”我对王敏说。说完,我把身子转了过去,王敏紧紧地拉着我的手,此时无声胜有声。

几个老乡掰了些玉米棒子,就地挖了一个小土沟,把玉米带皮整齐地码在上面,找些干树枝和干草放入土沟点燃,烧烤起了玉米。火苗吐着小红舌头,我们的身上暖和多了。老乡不停地用手翻滚着玉米,不一会儿,玉米的香气就被烤了出来,散发着诱人的味道。老乡让我们先吃。那一刻,我们的肚子真的饿了。虽然玉米的外衣被烤得黑黢黢的,可剥开之后,黄色玉米粒整齐地排列着,咬一口,别提多香了。我们边吃边说笑着,一身的疲倦和那忍不住的伤感被这一顿晚餐吃进了记忆里。

此时我们已经走了近八十里山路,真是人困马乏了。我们来到了车马店,就是人和牲口歇脚的地方。院子很大,到处都拴着牲口,还有装货的架子车。赶早的人忙着收拾准备出发。老乡把我们的西瓜车停好,把牲口拴到水槽前吃草,三位男性老乡被安排在大通铺的房子里。我俩住哪儿呢?用心的小老板把我俩领到了一间装满草料的房间,在土炕上扒出一小块地方,弄了一卷子铺盖放在炕上,就选了我俩下榻的地方。入乡随俗,没有挑选的余地,铺上被子,和衣而睡,伴着草料特

有的甘味,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,已经到了晌午。我们在车马店吃了碗面条,三头牲口连吃带歇也差不多了,我们就继续北上。就这样走走停停,第二天中午到达了延安。

延安是革命圣地,是毛主席居住过的地方。虽然我们特别想四处逛逛,但我俩非常明白,我们的任务是来卖西瓜的,等卖完西瓜再说吧!车队直奔市场,开始卖西瓜。西瓜每斤售价0.12元,现在看起来不贵。可上世纪60年代末居住在延安的人,花几块钱买个西瓜吃,也算是件奢侈的事。老乡为了招揽生意,使出了杀手锏——让我们两个知青卖西瓜。对于我们俩来说,卖东西还真不是第一次。在学校做“学工”时,曾到国营菜站和售货员一起蹬着三轮车到农村卖过菜。这一招果然奏效,来看北京知青卖西瓜的人还真不少。人们围拢在我们周围问这问那,问我们是北京哪个学校的?在哪儿插队?来这里生活习惯吗?话语中透露出延安人对知青的关爱。我们也是有问必答,不忘推荐我们的西瓜。当他们知道我们从洛川来,走了三天才来到延安,感到真不容易,不忘买个西瓜表示对我们的支持。老乡们把切好的西瓜让大家尝一下,主动帮顾客挑选,并承诺生瓜包换,秤给得足足的,顾客非常满意。诚信让我们赢得了市场,一下午就卖出去了一车多的西瓜。

时值盛夏,正午的太阳烤得我们汗流浹背。由于体会到这一路上的艰辛,我们再也舍不得吃一口西瓜,就想多给队上卖点儿钱回去。为了尽快把西瓜卖完,我俩建议走街串巷地叫卖。老乡一听有道理,按照我们的建议把西瓜拉到了家属区。这里的人们听说北京知青从洛川前来卖西瓜,出于好奇,少不了顺便买一个。

我们的西瓜在延安卖了不到两天,还剩下少半车。负责人俊峰决定把剩余的西瓜拉到甘泉去卖,还决定让我俩在延安多待一天,帮助我们实现登宝塔山、参观革命纪念馆的心愿,然后坐汽车回洛川。我俩看到卖西瓜的任务还没完成呢,怎能半途开小差?于是决定放弃参观,跟着老乡一起去甘泉。

延安到甘泉三十多里路,我们走了三个小时就到了。甘泉县的大街上、电影院旁边都留下过我们卖西瓜的身影。和老乡预料的一样,我们在甘泉卖掉了剩余的西瓜。

西瓜卖完了,我们坐在架子上。小毛驴似乎也为我们能够出色完成任务而高兴,一路小跑着前行。中途到了一个叫茶坊的地方,我们仍然住在车马店。这店不大,没有多余的房间,我们五个人被安排在一个房间内。房间内有一个大通铺,倒是很干净,我俩睡一头,那三个老乡睡另一头,就这样过了一夜。会计俊峰还在这里买了点菜,利用店里的厨房亲自给我们做了一顿臊子面,算是犒劳大家。

回到村里,一同去的几个老乡直夸我俩能干,我们也开了女知青出去卖西瓜的先河。

“我的第二故乡”——北京知青回延安掠影